

然。君子不可不“固”，比如固穷，而其“重”和“威”都是为了学之“固”，但又不可太固太我，否则就成“锢”了。

自信为“刚”，自是则为“愎”。刚而毅，能容人，可致远；愎而塞，积为咎厉，乃取死之道。史上不乏贤德者，亦多有自知之明，然往往为自恃所累。比如王荆公即自信太甚而有刚愎自用之讥，程颢谓其“性很（狠）愎”，司马光论之甚公，曰“安石贤而愎”。李贽也承认王安石以民瘼为急，以国家为念，惓惓之心可昭日月，但“半山过于自信，反以忧民爱国之实心，翻成毒民误国之大害”。不评价王安石的历史功过，但一般而言，狠愎自信，不听劝解，终归有干天和，失却盈谦之训，难免招灾。

妄自卑薄，以亏时遇，当然不妥。无所忌惮，自高自大，亦难有作为，因为这种“自我重要感”有时会成为自我埋葬的致幻药。自我感觉良好，不是自信，而是虚荣心和面子在作祟。我们迫切需要摆脱简单的功利主义诉求，要有更大的理想，但无论如何都需要踏踏实实从一点一滴做起。而所谓“登高自卑”，不仅是脚踏实地，更可以从字面去理解：胸中有丘壑，则必不会自满；眼中有世界，则不会自傲。

王阳明视“傲”为“凶德”，“今人病痛，大段只是傲，千罪百恶，皆从傲上来。傲则自高自是，不肯屈下人”，而仁义忠孝皆不见矣，因为“既自以为是，则非求益之心”。自是有如自欺，终因饰非长敖而归于凶顽鄙倍。王阳明独特的“良知说”和“格物说”也与“傲”相关：知

轻傲便是良知，而除轻傲即格物。他甚至说，“欣戚得丧，爱憎取舍之类，皆足以蔽吾聪明睿知之体。”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爱憎，而是不能因此患得患失，否则自蔽自封，看不到更大的世界，则不能入于道矣。

自信者对内不惮自我批评，对外不辞兼收并蓄，乐于闻过，甚至主动自揭其短。自强自立，自珍自爱，乃是做事的前提，但同时还需辅之以“爱而知恶”，因为“从善如流，尚恐不逮；饰非拒谏，必是招损。古人云：‘苦药利病，苦口利行。’”自省自纠，方为君子。所谓“学”，主要在于“省”，即朱子所谓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其自治诚切如此，可谓得为学之本矣”。我们不仅要有纳谏的雅量，更要为了美好的未来而主动求谏——这才是强大的心和强大之道，如纪昀所说，“取多用宏，其魂魄独强矣”。相反，护短拒谏，无道自矜，自取其祸。

湛甘泉所谓“惟有自知自信而不自负最的当”，实为至言，却难以把握，但也并非无从下手。海南大学教授张志扬说，“人既不能只相信自己，又不能不相信自己，如何在临界中把握关系，特别是在临界中把握怎样的关系、如何把握，展示了哲学史的迷途。不独西方，它乃是全人类的事业。”目前我们可能还暂时无法说清楚“怎样”或“如何”的问题，但作为一种方法，“临界之思”是有效的指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包括内容上的“古今之变”“中西之争”，以及方式上的“自信”“自是”或“爱恶”在内的所

有问题，都不能囿于一方而自蔽眼界，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其“全”，即如张志扬先生所谓“不在对立之中”，应在“对立之上”。

万事万物各有优劣，爱之当明其短，憎之亦思其长，则能成万世伟业。反之，故步自封，沾沾自喜，则容易从绝对主义滑向相对主义，最终归于虚无主义——历史不断上演这种两极摇摆。古人“弘”“毅”并称，坚从天道，信守本心，宽广堂正。苟能“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”，就会达到“德善”的境界，这是圣人“平常心”和“为天下浑其心”（《道德经》49章）的结果。

当前，我们已经从“站起来”“富起来”走到了“强起来”的新时代，更需要自信自强，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，心怀天下，不负使命。H

（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社科中心教授、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）